

毛泽东耐人寻味的生日宴

□ 孙国林

延安时期，毛泽东为许多人祝过寿，却拒绝别人为他做寿。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相对稳定下来，人们这时候想为毛泽东祝寿，但他依然坚持不过生日，还说：“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步入老年后，毛泽东似乎开始注意自己的生日，但他仍旧不接受别人的宴请，只是在每年12月26日这一天，邀请一些友人聚一聚，餐桌上没有珍馐美味，更没有寿星端坐、接受别人跪拜祝寿之类的旧俗。而毛泽东的生日也不是年年都过，过法也不同，一切由他自己决定，耐人寻味。

50岁生日：拒绝做寿。

194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50岁生日。按照中国的习俗，50岁是大寿，理应好好庆贺一番。这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致信毛泽东，报告了这一计划。这是毛泽东1910年离开故乡以来，第一次遇到“生日问题”。

然而，当毛泽东看了凯丰来信后，他的第一反应是拒绝。经过认真考虑，毛泽东在4月22日给凯丰回信说：“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

作为革命领袖，毛泽东拒绝为自己做寿，但他对许多老同志的生辰却记挂在心，如对吴玉章、林伯渠、朱德、徐特立等，都用书信、题词和其他形式热情祝寿。他还邀请住地枣园村24位年过60的老人赴宴，为他们集体祝寿。

59岁生日：请来一个人，同吃清汤面。

1952年12月26日上午，毛泽东一醒来就吩咐卫士叫来他的保健医生和行政秘书王鹤滨陪他吃饭。紫云轩的过厅是毛泽东用餐的地方。王鹤滨到时，八仙桌上已摆了几碟小菜，有酱菜、辣椒、腐乳和酱牛肉，都是厨师廖炳福按照湖南口味制作的。桌上没有毛泽东经常吃的米饭和炒菜，却多了清汤白面条，两只中号高脚玻璃杯里，已斟好了半杯葡萄酒。这种吃法，王鹤滨很少见，不免有些诧异。毛泽东从卧室走出，招呼王鹤滨入座。他举起酒杯微笑着说：“王医生，来，干杯！今天是我的生日。”说完，一饮而尽。王鹤滨这时才知道毛泽东请他吃饭的因由，心中十分激动，赶紧说：“祝主席身体健康！长寿！”说完也一饮而尽。毛泽东又喝了一口酒说：“王医生，咱们不祝寿，但是可以吃清汤面，是吧？”说着，就要拿碗给王鹤滨盛面条。王鹤滨急忙接过毛泽东手里的碗，先给毛泽东盛了一碗面条。

毛泽东拌着小菜吃得很有香，高兴地对王鹤滨说：“做寿是不会使人长寿的，对吧？人活百岁就不得了喽！”这话是针对一位工作人员前几天的话说的。当时，毛泽东听了“祝您万寿无疆”的话后说：“哪有活一万一岁的？”稍停，又说：“哪里有什么万寿呀，人是不会活到万岁的！”

60岁生日：不准公开发表贺电、贺信。

195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花甲”大寿。党中央收到世界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友好团体和人士发来的贺电、贺信，热烈祝贺毛泽东

60大寿。毛泽东决定，对于这些贺电、贺信，一律不准公开发表。可是，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抑制不住对主席的敬仰之情，想给他祝寿。这天，中央办公厅警卫科长申虎成很早就来到值班室，他走到毛泽东床前，把大家的心意报告给他，并祝他健康长寿。毛泽东听后微笑着点点头说：“谢谢同志们。”稍停，又对申虎成说：“你去备点酒，让老廖师傅做4个菜，一个汤，请大家一起吃顿饭。”毛泽东还特别叮嘱说，别忘了告诉烧锅炉的工人和秘书同志们，请他们一起来。

69岁生日：作诗设家宴。

1962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69岁生日，他写了一首《七律·冬云》：“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这天，毛泽东在菊香书屋备了两桌便饭。参加寿宴的除了毛泽东的亲属之外，他还邀请了4位80岁以上的老人。其中有3位是他的湖南老乡：章士钊、程潜、王季范，另一位是叶恭绰。毛泽东考虑到这些朋友年事已高，所以发请柬时关照，每位来客可以带一位子女来。饭前，毛泽东同4位老人谈笑风生，谈古论今，十分开心。

70岁生日：办了一次“像样”的家庭寿宴。

196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0岁大寿。古云“人活七十古来稀”，加上此时全国经济形势明显好转，中苏论战初获胜利，毛泽东心中充满喜悦。他主动提出，自己出钱办酒席，

设家宴请大家，一起过这个生日。

宴席设在颐年堂，时间定在12月26日晚上。对于吃什么菜，喝什么酒，请什么人参加，设几桌菜等，毛泽东都作了具体交代。庆寿家宴结束后，毛泽东提出要与每个人照相留念。

毛泽东的大女儿李敏和丈夫孔令华、侄女毛远志和丈夫曹全夫及他们的女儿曹立亚、毛泽东的表侄孙女王海容，都来看他，毛泽东显得很高兴。饭后，他还特意穿了那身浅灰色的中山装，兴致勃勃地与孩子们一起照相留念。

最后一个生日：把苹果分给工作人员。

1975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82岁生日，也是他最后一个生日。这次生日，餐桌上也很简单，只是比平时多了几样菜。这顿生日饭，毛泽东喝了胖头鱼汤，他高兴地说：“胖头鱼汤好香噢！”吃的时候，他坚持自己用勺舀汤喝，不让别人帮忙。

毛泽东的这个生日，金日成送来了朝鲜的大苹果表示祝贺。这些苹果，装在竹制的圆形果篮里，篮子的把上缀着两个红色缎带，上面有金日成用朝文亲笔写的“祝毛泽东主席长寿”几个字。毛泽东见了老朋友送的礼物，自然高兴。他拿出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端详片刻，然后对身边的人员说：“这苹果，留下两个，其他的你们分着吃吧。”在分享中，毛泽东过了他人生中最后一个生日。

（摘自2009年第10期《世纪风采》，原标题为《伟人毛泽东的简朴生日宴》）

中共党史研究的第一部著作



□ 钟润生

蔡和森是中共二大的中央委员，并担任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的主编，他自始至终参加了中共三大的筹备工作，并且赞成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中共三大后，他撰写的多篇文章中记述了中共三大会议情况，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党史资料。

1926年初，蔡和森在莫斯科担

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期间，向中共旅俄支部作了长达5万字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的报告，系统地回顾和总结了从中共一大到四大的历史及经验教训，这是中共党史研究的第一部著作。

文章对建党初期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作了认真总结。他认为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以往的“中国革命之所以尚未成功，即在缺乏领导阶级，亦即是缺乏有很好组织、很好政策的阶级势力”。然

而“工人阶级独立斗争也是不能得到胜利的”，如“欧美各国工人运动的失败，即在没有抓住他的同盟军”，中国二七罢工的“教训就是孤军奋斗”。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克敌制胜的法宝，但“无产阶级的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不是为资产阶级利益而参加，附属于资产阶级，而是为阶级的利益而去参加民族革命，所以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不仅是独立的，并且为民族革命的领导阶

级。”他还强调对马列主义不能照抄照搬，“应当运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要在自己的斗争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武器，即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才行”。明确地提出要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是他在理论上的一大贡献。

（摘自2011年7月3日《深圳特区报》，原标题为《蔡和森：最早叫出“中国共产党”》）

确认党的诞生纪念日的第一份中央文件

□ 李 颖 陈郝杰

第一次正式以中央文件形式确认7月1日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并要求进行相关纪念活动，是1941年6月《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抗战4周年纪念指示》。《指示》指出：“今年‘七一’是中共

产生的20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4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指示》强调，宣传的要点是：在党外，“要深入的宣传中共20年来的历史，是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历史。

他最忠实的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在党内，“要使全党都明了中共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在今天他已成为团结全国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决定因素”，“每个党员都要正确懂得如何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方针，要加强策略教育，与学习党在20年革命斗争中的丰富

经验。”

自从1941年6月第一次正式以中央文件形式确认7月1日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并要求进行相关纪念活动后，纪念“七一”成为中国共产党每年的例行活动。

（摘自2017年6月29日《人民政协报》）

周恩来妙语评项羽

□ 亦 名

1966年，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新街口总政排演场审查出国节目时，对京剧《霸王别姬》中的项羽，从头至尾连用了六个“一”字开头的成语，这六个成语不仅把项羽的性格特征和失败的全过程刻画得入木三分，而且妙语连珠，风趣幽默，画龙点睛，每句成语都运用得恰到好处，听罢令人既哑然失笑，又耳目一新。

京剧《霸王别姬》的一开头就是刘邦发兵攻打项羽，接着是项羽金殿议事。群臣根据当时的不利形势，纷纷劝阻项羽不要出兵迎敌。但项羽刚愎自用，不听劝阻，决意出战，最后竟然蛮横地宣布“退班”。戏演到这里，周恩来总理轻轻地说道：“一言堂。”

项羽回到内宫后，虞姬又苦口婆心，继续规劝项羽千万不要出兵迎战，以免中了刘邦的奸计。项羽却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武断地说道：“孤意已决，明日发兵。”周恩来总理评论说：“一家之长。”

当戏演到项羽率领军队孤军深入到刘邦早已设好的埋伏圈时，周恩来总理评论说：“一意孤行。”

随后，当项羽被围城下难以脱身时，周恩来总理评论说：“一筹莫展。”演到虞姬安慰项羽，项羽心情沮丧，摔了酒杯，咏唱“力拔山兮气盖世”时，周总理十分惋惜地说道：“一曲挽歌。”

戏快要结束时，项羽四面楚歌，虞姬被迫拔剑自刎，香消玉殒。周恩来总理叹了一口气，说：“一败涂地。”

（摘自2010年29期《政府法制》）

瞿秋白的绝命词

□ 吴奔星

北宋晏殊的《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这是一首广为传颂的小令，其中“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一联，被人推为古今绝唱，无有出其右者。

瞿秋白烈士1935年6月18日于福建长汀狱中就义前写的一阙《浣溪沙》绝命词：“廿载浮沉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做英雄。湖海栖迟芳草梦，黄昏已近夕阳红！”

在艺术性上，晏殊的词似可以评为同一词牌的压卷之作。但与瞿秋白的词相比，晏殊的词便

明显地未能将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地统一起来。晏殊的词不过写个人的悲欢离合，瞿秋白的词则把个人和集体的命运，紧密联合起来，作了整体的思考。

瞿词一字一泪，读之既痛其心境的悲凉，又惜其才华的早凋，正如尼采所说，动人的文学作品都是用血写的。此词感情集中，文采斐然，掷地有声，下片的“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毫不逊色。瞿词跳动着历史的脉搏，叩响着时代的旋律，更与晏词迥然有别。从风格看，晏词婉约可爱，瞿词豪迈可敬。

（摘自2013年第35期《文教资料》，原标题为《读瞿秋白的绝命诗》）



留给我的宝贵财富

爷爷董必武

□ 董绍新

1975年4月2日，我的爷爷董必武去世了，那年我5岁，懵懵懂懂的，只知道家里的一位老人不在了，对他的印象却极为模糊。上学后，我在语文课本里读到了关于他的文章，心里除了有些小骄傲外，更多的是感到那是一段很遥远的往事。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有关爷爷的故事我了解得越来越多，记忆深处的那个身影也慢慢鲜活起来、厚重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爷爷一直坚持使用刚进城时分配给他的老式办公桌，几次搬家，工作人员都想换张新的，但他始终没答应。爷爷坐的是一把旧转椅，由于转轴松了，坐上去既不稳固也不安全，更别提转动了，可是他总不肯换，只是让人拆了底座，用木头重新做了4根椅腿，就这样一直坐到逝世前。爷爷平时写字，多用毛笔，笔头掉了，就用线或牛皮筋绑紧继续用。他练字从来都是用报纸，写诗、写文章也是以头一年用过的旧日历牌和节目单等废纸作底稿。

爷爷在晚年患有多种疾病，地方上的一些负责同志请他到条件好的地方去疗养，但他都婉言谢绝了。他总说：“我一走动就要兴师动众，给地方人力、物力增加负担。”

1972年冬，因爷爷身体每况愈下，中央批准他去广州休养。当时爷爷住在医院里，工作人员担心他长途旅行身体支撑不了，就提议坐飞机去，又动员我奶奶何莲芝和子女一起劝他。但是爷爷坚持要坐火车，并且严肃地说：“这对我来说，是个原则问题！”随后，他详细计算了坐飞机会消耗的油量，并耐心地教育大家：“目前我国国家正处在建设时期，油产量还不多，坐飞机是要用很多油的。而在火车上挂节车厢，既不影响铁路运输，又可以看看沿途祖国的大好河山，何乐而不为呢？”他还再三叮嘱：“我老了，不能为国家和人民多做事了，所以今后无论办什么事，都要尽量少给国家和人民添负担。”我们的国家人口多、底子薄，一穷二白的面貌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我们要力求节约。”

爷爷在生活上厉行节俭，但是把钱花在助力民族振兴、培养下一代身上时，他却异常大方。地处武汉市武昌区粮道街的武汉中学，前身就是爷爷与陈潭秋等人于1919年共同筹办的私立武汉中学。当年，爷爷怀着唤起民众、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的宏图大志，毅然当掉了自己唯一的一件皮袍，将换来的20元钱充作了办学经费。如今的武汉中学，大门口矗立着一尊爷爷的雕像，雕像背后的墙上刻着4个刚劲有力的大字：朴、诚、勇、毅，这是爷爷当年亲自拟定的私立武汉中学的校训。当年，这所学校的很多学生就是在他的精心培养下，成为忠诚无畏的优秀共产党员。

□ 董绍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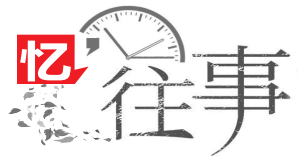
新中国成立初期，爷爷在红安老家的一些亲友看他当上了政务院的副总理，认为他做了“大官”，陆续写信给他提出安排工作、调动工作、照顾生活等请求。对此，爷爷一律回信婉言拒绝，同时还向他们讲清不能给予照顾的原因。他在回信中说：安排、调动工作应向组织请示，不能向他个人请示；鄙视劳动、想不劳动或少劳动就有较好的收入和享受，是陈腐的甚至是很坏的旧观念；做工作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人民大众的利益问题解决了，革命者的个人利益也就解决了；决不能把干革命、入党当作个人谋利益的手段……

后来，爷爷干脆写了一封通函，打印出来，分别寄给家人和亲友，对他们进行事先教育，打打“预防针”。

1966年，爷爷在武汉接见武汉中学代表时，对他曾经写下的校训又作了解释：“朴就是艰苦朴素，诚就是忠诚、诚实，勇就是勇敢，毅就是要有恒心和毅力……”

“朴、诚、勇、毅”这4个字深深影响着我，教导着我如何为人、做事。爷爷离开我们已经43年了。如今，国家的实力日渐雄厚，人民的生活日益富足，客观环境变了，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严格要求身边亲属子女的优秀传统不能丢。我们要学习爷爷的优秀风范，在新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接续奋斗。

（摘自2018年第5期《党建》，原标题为《爷爷董必武留给我的人生财富》）



方志敏的金钱观

公家的钱，该怎么花？方志敏烈士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

土地革命时期，方志敏曾是模范根据地的创建者。作为根据地最高首长，他规定，从自己开始，所有干部一律减衣缩食，每天只有四分钱菜金。

有一次，他的妻子要做演出服，便从红军在白区缴获来的物品中要了一块绒布。方志敏知道后，马上把妻子批评了一顿，并要求她立即送回。

方志敏也有不“抠门”的时候。那时，部队购买一支枪，要花50块银元“天价”。买一批枪，花掉的钱堪称巨资，他一点也不含糊，果断批准。

1935年初，方志敏率领红十军团北上抗日陷入危机，途中还被国民党军队追击包围，饥疲不堪的方志敏不幸被两个国民党兵发现。他们猜到方志敏是共产党的省主席，满以为自己赚大发了，可以从他身上捞到“金银珠宝”。

一个自称是“老出门儿”的兵痞在他的裤脚、衣缝仔细地捏了起来，认为肯定有金戒指之类的东西，可是一无所

获。见此状况，另一个兵挥动手榴弹叫道：“快把钱拿出来！不然就是一炸弹！”

方志敏丝毫没有畏惧，而是轻蔑地说：“共产党的官不像国民党的官那样个个有钱！”

后来，两个兵搜到累瘫也只搜到方志敏工作所用的一块怀表和一支钢笔，此外分文没有。他们只好商定将卖怀表和钢笔的钱均分。

方志敏被囚后，叛徒孔何宽以少将参议的官职和每月500块大洋薪俸来引诱他。面对“高官俸禄”的诱惑，方志敏不为所动，他痛斥孔何宽：“无耻的东西”，并严厉拒绝：“我不爱爵位也不爱金钱！”

当时，还有朋友出于仰慕送来财物，方志敏马上转送狱中病饿的难友。国民党送来让他交代秘密的纸笔，他用来写出许多宝贵的文稿，并秘密托人通过鲁迅等关系转送给了党组织。

（摘自《红家谱》，徐焰、马祥林等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